

修订版

中国民主党派史

(新民主主义时期)

张军民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國民主黨派史

(新民主主义时期)



张军民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 / 张军民著.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6.5
ISBN 7-207-06940-5

I. 中… II. 张… III. 民主党派—党史—中国 IV. D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5816 号

责任编辑: 李 珊

封面设计: 李 梅

书名题签: 屈 武

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

著者: 张军民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社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150008)

发行电话: (0451) 82329930 (0451) 82317541

电子邮件: migrant33@yahoo.com.cn

网址: www.longpress.com

印刷: 绥化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20.125

字数: 520 000

版次: 2006年5月第1版 200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207-06940-5/K·794

定价: 48.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再版前言

这部《中国民主党派史》出版发行已有十几年,早已没有书了。应各方面的要求,今日修订再版,以飨读者。

本书出版时曾引起学术界和统战工作部门及各民主党派的广泛关注。当时就有25家报刊杂志评论了这部书,有许多著名专家学者,如廖盖隆、朱真、高放、郑德荣、谭方之、司徒丙鹤、唐纯良、贾慰昌等,在《人民政协报》、《新华文摘》、《文汇报》、《黑龙江日报》、《山东社会科学》等报刊发表评论文章,给予很高评价,称这部书:“是一部真正的历史书”,“有独到的开创性的贡献”。还有民主党派的老前辈如屈武、孙晓村、夏从本、薛博民、肖翰香、蔡义江等也以不同的方式高度评价了这部书。

当时相关报刊杂志评论的主要观点,摘其要者有:

(一)将中国众多的民主党派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对象,对其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性,作出了系统完整的研究、总结和概括,揭示并阐述了中国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走过的历史道路及其基本经验。这是一个创造,而且有着明显的特色与优势。

(二)较深入地考证了中国民主党派所谓的由来及其内涵与标准,首次在“政党林立,派系纵横”的旧中国的政坛区分出了18个民主党派。18个民主党派之说,不仅勾画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民主党派的整体阵容,同时也理清并阐明了持续发展至今的8大民主党派的历史渊源和沿革发展的基本线索与特征。

(三)首次提出了中国民主党派历史分期的方法与标准的理论,并将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历史,划分为五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建立了中国民主党派历史研究的较为科学的新体系。

(四)根据中国各民主党派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斗争所具有的“有分有合”的特点,不仅将各个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及其斗争实践写得翔实生动,而且将众多民主党派共同开展的斗争,以及与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合作也写得充实丰满、多彩多姿,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奋斗的历史。

(五)系统挖掘整理了民主党派历史资料,不仅披露了许多鲜为人

知的珍贵史料,而且理清了许多历史疑案,对一些有争论的重大历史问题,诸如,几经演变的党派组织系统、重要人物及事件、重大理论及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和评价等,均作了较深入的考证,并提出了有说服力的新观点。

(六)较好地做到了思想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由于坚持了实事求是、思想解放的原则,以治史的严肃性和科学性,大胆探索开拓,所以不仅有创新和突破;而且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发扬民主党派优良传统方面,这本书也有重要价值。^①

所以,这部书出版发行虽已有许多年了,但是仍有它的价值和地位。本次修订再版也吸纳了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

当然,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著作,它既反映当时的研究程度与水平,也会有不足和还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所以,敬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在这部书再版之际,我要特别感谢诸多老前辈当年对我的支持和鼓励。著名理论家、历史学家、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主任廖盖隆教授曾为本书作序,当时廖公正在准备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的大会报告,他在繁忙的工作中挤时间阅读了大部分书稿,并亲自撰写了万余字序言。我非常惊喜,真是没有想到廖公能这样支持我,因为我当时还很年轻。廖公说:“我是有感而发。”他对这本书作了中肯的评论,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他对于如何深化中国民主党派历史研究,尤其是对社会主义时期民主党派历史的研究,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指导性意见和建议,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长远的指导意义。廖公的万余言,也体现了老一辈理论家对青年学者的关怀与支持之情。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誉主席屈武老为本书题写了书名,他当时已是九十几岁高龄的老者,他不但慨然答应题写,并认真书写了横竖两幅。出版社编辑说,屈武老的墨宝是一字千金,所以,都用上了。现今这两位前辈都已作古,本书修订再版也是我这个晚辈对他们的一种缅怀和纪念。可以告慰二老的是,我于去年10月又完成了一项国家课题:《中共与民主党派关系史》,已通过结题,即将付梓。

这里还要感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李珊同志,由于他们的重视和支持本书才得以修订再版。

作者
2005年6月

^① 上述各种观点均见于当时各有关报刊杂志的“书评”。

序

廖盖隆

青年史学工作者张军民是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教系副教授,他费时十余年研究写成的著作《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我认为是值得向广大干部和青年推荐的,因为这部书有以下的特点和优点,因而是对读者有益和引人入胜的。

张军民著《中国民主党派史》的主要特点和优点

一是它的资料比较完整而丰富。它利用的资料有民主党派历史上的各种原始文献资料、报刊资料(各民主党派在历史上创办的各种报刊杂志)、档案资料(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共中央统战部档案资料室、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等处存放的有关档案),解放前出版的各种民主党派历史书,以及解放后出版的各种有关资料,国外及港台出版的有关民主党派历史的书刊资料等等,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这本书叙述了中国 18 个民主党派的历史,包括持续存在到今天的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台盟 8 个民主党派;经历了长期发展,于 1949 年 9 月参加了中国人民政协,但由于各种原因而于同年底宣布结束或与其他党派合并了的民主党派有 3 个:中国人民救国会(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联)、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促);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但早已结束或与其他民主党派溶合了的民主党派有 5 个: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民权同盟)、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民族大同盟)、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旅美联盟)、职教社派、乡村建设派;以及在历史上代表大地主大资产

阶级的在野派的曾经是落后反动的党派,但在抗日时期以及日本投降后一段时间内参加了民主党派的行列,后来又从民主党派中分裂出去、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党派有两个:中国青年党(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国社党,后改名民社党)。书中对于这18个民主党派(或一度是民主党派)的活动和历史作用,都作了如实的叙述,因而反映了中国民主党派历史(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全貌。

二是这本书对于民主党派历史的分期,既参照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分期,又按照民主党派历史活动的特点而作了一些变动。即分为:

(一)民主党派的创建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时间是从1928年3月“第三党”即中华革命党(1930年8月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创立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邓演达的被逮捕杀害;

(二)民主党派为反蒋抗日、救亡御侮而斗争,时间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全面抗战爆发。在这个时期中,“第三党”继续存在和发展,并于1935年11月改组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新出现的民主党派有致公党(它于1925年10月在美国旧金山成立,1931年10月在香港召开“二大”,宣布反蒋抗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年12月成立,1933年6月因受镇压而结束)、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李济深等领导,于1935年7月成立,1937年10月结束)、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5月建立,1949年12月结束);

(三)民主党派为坚持团结抗战、实现民主宪政而斗争,时间是从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这个时期,第三党、致公党、救国会继续存在和发展。新出现的民主党派有职教社派(由职业教育团体演变成为抗日民主运动中一个有影响的政治派别)、乡村建设派(由原乡村建设协会演变而成的抗日民主派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3月建立,其前身是1939年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1944年9月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另外,中国青年党和中国国家

社会党抗战爆发后参加了抗日民主党派的行列；

(四)民主党派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时间是从1945年8月抗战胜利到1947年11月民主同盟因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而宣布解散。这个时期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国农工民主党,救国会改组建立中国人民救国会,致公党召开“三大”正式复党,民主同盟继续存在和发展。新成立的民主党派有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5年10月建立,1949年11月结束)、中国民主建国会(1945年12月建立)、中国民主促进会(1945年12月建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6年4月建立,1949年11月结束)、九三学社(1946年5月建立)；

(五)民主党派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而斗争,时间是从1947年11月民主党派领导人被迫转赴香港或转入地下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时期,农工党、救国会、致公党、民盟(1948年初在香港宣布恢复活动)、民联、民促、民建、民进、九三等民主党派继续存在和发展。新建立的民主党派有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冯玉祥领导,于1947年11月建立,1948年7月结束)、台湾民主自治同盟(1947年11月建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年1月建立)。

我认为,这个分期方法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民主党派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的。

三是这本书可以说是一本真正的历史书,它力求根据可靠的原始资料,把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真实地再现出来,有故事情节,有历史人物的生动的言论活动,有叙述,有议论。这本书对于被周恩来称为“人格很高尚”的卓越的民主革命家、“第三党”的创建人邓演达,对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而被不正确地开除出党了的“第三党”的另一个领袖、始终对人民的事业忠诚的谭平山,对1924年参加了国民革命、1927年又参加了蒋、汪的反共,但从“九一八”事变以后重新主动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卓越的民主革命家冯玉祥(特别是对他在1947年到1948年在美国展开的反对蒋介石的勇敢的宣传鼓动)作

了生动的叙述和正确的评价。因此这本书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相当吸引人的可读性。

虽然这本书只叙述了中国民主党派新民主主义时期的20多年的历史,而没有涉及中国民主党派已有将近40年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因而还不能说是中国民主党派历史的全部,但它作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中国民主党派史是完整的。我希望,将来会有同样是有血有肉的《中国民主党派史》(社会主义时期)问世,这同样将是很有意义的,甚至可能是更有意义的工作。

中国民主党派的产生成长和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战略

中国民主党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推动和领导下,在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合作下产生、成长和发展起来的。

毋庸讳言,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前,中国共产党犯过“左”倾关门主义、不要统一战线的错误,因而拒绝和第三党合作,没有对1933年6月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战给以有力的支持和正确的引导,也没有对同年冬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给以有力支持,结果使革命事业受到了损害。但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组织千千万万群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的广泛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战略。

毛泽东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在1939年10月总结中国共产党18年的经验时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

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

毛泽东在1947年12月所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又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各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可能胜利的。”

因此，从遵义会议以后，特别是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中国共产党用极大力量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包括抗日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这个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争取、团结当时已经存在的民主党派，影响、推动新的民主党派的建立和发展。在抗日时期，这个工作是为着“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服务的。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党派的合作，对于迫使蒋介石勉强维持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直到抗战的最后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又和各民主党派亲密合作，为争取以和平的方法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主改革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所进行的合作奋斗，曾迫使蒋介石同意了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人民有利的五项政协协议。但是随后不久，蒋介石就撕毁了政协决议，进而从1946年6月下旬起又撕毁了停战协议，从而表明他是顽固地坚持独裁、内战、卖国的反动政策，顽固地反对国内和平和以和平的方法实行民主改革的。这就暴露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使全国广大人民和各民主党派在国共两大政党的对立斗争中，最终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从总体上来讲，各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代表他们的各民主党派之所以选择了跟共产党合作、

接受共产党领导的道路,这是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周恩来说:“我们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不能发展,他们想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谋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压迫民主党派,因此他们就要反对国民党的独裁。这种历史条件,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能够在民主革命时期逐步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大党的对立斗争中,选择了中国共产党。”^①

周恩来接着说:“当然,单是有了历史发展的有利条件并不能解决问题,关键在于领导,在于党的政策。党领导得正确,才能使历史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变成现实。”^②

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的正确政策当然首先要对他们有合作的愿望,并且主动和他们合作;然后在合作中推动他们进步,争取他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自愿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要实现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的领导,正如毛泽东1948年1月为党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关于目前政策中几个重要问题》中所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者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就是这样做的。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和统一战线方面工作的主要领导者,周恩来同民族工商业家、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了频繁的接触、

①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47~348页。

②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48页。

交谈,率领他们向国民党当局作争取抗战、团结、进步(在抗日时期)和争取和平、民主(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斗争,并且不断地取得了斗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采取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在这方面如果发生了错误,就立即改正。

中国共产党还依靠民主党派中那些与共产党真诚合作和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进步分子,去经常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推动民主党派的进步,跟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同时忠实地反映民主党派的意见和要求。这样做,对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民主党派本身的不断进步和加强同共产党合作都是有好处的、必要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民主党派不单纯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具有各民主阶级联盟的性质。

周恩来说:“各民主党派,不论名称叫什么,仍然是政党,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不能用英、美政党的标准来衡量他们。他们是从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民建主要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当然里面还有进步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民盟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集团,在阶级关系上有阶级联盟的性质,包括小资产阶级分子,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还有极少数劳动阶级分子和一部分封建分子,而以小资产阶级分子为主。民革主要是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中上层分子,还有许多开明士绅和其他爱国人士,他们反蒋、要民主,但封建性较浓。各民主党派中都有而且必须有进步分子,这样才能与我们很好合作。但不能把民主党派搞成纯粹进步分子的组织。若都是进步分子,还有什么意义呢?里面必须包括广大中间分子及一部分右翼分子。”^①

周恩来又说:“现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单一阶级的政党?这不是应不应有的问题,而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很难产生,旧中国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内有封建主义的压迫,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动摇性这个‘肺病’是先天不足遗传下来的,一开始就没有力

^①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71~172页。

量,没有形成强大的政党。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共产党在农村搞了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形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在今天,如果搞单一阶级的资产阶级政党,势必走欧美资产阶级的道路:垄断市场,向外侵略,反对共产党。但这条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是不被许可的。因此,中国的民主党派只能是承认《共同纲领》,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如现在的民主建国会那样。但民主建国会并不是单一的资产阶级的政党,它里面有进步分子,有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具体历史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必须走今天这样的路,民主党派也必定是今天这样的类型,这是历史的必然。”^①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多党派合作

中国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存在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派合作,而且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存在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派合作。这个理论是由周恩来首先作了系统的科学阐述的。

周恩来说:“党派存在与否,不取决于任何政党和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由客观的历史发展所决定的。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也曾经想争取同社会革命党合作,同少数派孟什维克合作,甚至想争取资产阶级能接受国家资本主义。但是,由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当时正遭到十四个国家的武装干涉,同时又进行着国内战争,俄国资产阶级和其他党派都敌视苏维埃政权,只剩下一个俄国共产党继续把十月革命的胜利坚持下去,因此在苏联就没有完全实现列宁提出的跟各党派合作的设想。然而,在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列宁的设想实现了。”^②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党派合作之所以能实现,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把历史条件所提供的可能变成了现实。

^①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79页。

^②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47页。

中国共产党正象自己的名称所表明的那样,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就是要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或者如同毛泽东早就说过的:“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①所有这些是人所共知,也是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所了解的,然而由于经过新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他们仍然选择了跟共产党合作,接受共产党领导的道路,这就证明他们是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相当思想准备的。这也是因为他们懂得,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是采取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革命胜利以后的相当时期内仍将容许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同时他们知道人民政权是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逐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在这种情况下,在民族资产阶级作为剥削阶级被消灭的同时,民族工商业家将得到生活上工作上和政治上的适当安排,他们作为个人将得到改造。因此,他们就认为,这样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什么不象苏联那样实行共产党的一党制,而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制,即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派合作呢?

周恩来早在1950年4月的一个讲话中就指出:“民主党派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有一种看法,认为没有他们,岂不少些麻烦?这是不对的。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现阶段是四个民主阶级的联盟,工人阶级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碰到其他阶级的人,问题只是有组织与无组织罢了。事实说明,有组织比没有组织更好。我们已经把工、农、妇、青组织起来了。同样,把上层政治活动分子组织起来也有必要。组织起来好处很多,便于他们学习”(这是一);“便于他们把各个阶级的意见反映给我们”(这是二);“在政治上他们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14页。

也能够更好地和我们配合,有些工作他们去做有时比我们更有效”(这是三);“在国际上也有影响”(这是四)。因此,周恩来作出的结论是:“民主党派的成员在我们的帮助和教育下,愿意同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我们多了一批帮手,岂不是很好嘛!”^①

关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周恩来在1962年4月所作的一个讲话中作出了总结,说:“革命胜利以后,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起了作用的,动员了社会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参加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得比较顺利、比较快。”^②

那么,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剥削阶级被消灭以后,是否还需要有各民主党派存在,是否还需要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派合作存在呢?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于这个问题都作了完全肯定的答复。毛泽东在1956年4月所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就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周恩来在1957年4月24日所作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讲话中系统阐述了这个方针的重要历史意义,同时明确地提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派合作的科学概念。

周恩来尖锐批评说,“共产党内总有一部分人思想不那么通,好象讲到社会主义,就只应该有一个党才对。这是教条主义的态度。”周恩来指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是中国的历史条件的产物。他说,“既然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都能和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共同合作,团结在一起,那么,怎么能够设想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不能同民主党派、党外人士继续合作下去呢?这是说不出道理的。”

“那么,民主党派究竟存在多长时间呢?能不能说共产党多活几年,其他党派少活几年?如果这样想,就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了。

①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72页。

②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431页。

因为这些民主党派还会有发展,还会有一部分人愿意参加,而这些党派的成员又很努力工作,大家团结在一起,只是思想上有些不同的意见,那么,就没有理由说谁先结束,谁后结束。也有人会说,如果这些人都参加共产党,不是就变成一个党了吗?当然,这是可以设想的。但为什么一定要其他的民主党派都参加共产党呢?一些民主人士继续留在民主党派里面,和我们一道合作,有什么不好?”

“各民主党派联系群众的方面不同,可以听到一些不同意见,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是有利的。比如民革,它就是跟原国民党出身的、曾经当过政的一些人有联系,不管是上层的、中层的或下层的意见,它都可以听到,而这些正是共产党不大容易听到的。又如民盟,它在知识分子圈里可以听到更多意见。有一次我来杭州,回去时在飞机上看了费孝通先生的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把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一些想法都说出来了……再如九三学社联系的科学家比较多;民建主要是联系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者;民进联系中小学教员方面。它们都有各自不同的对象和特点。不仅在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是社会主义建成以后,由于成分来源的不同,人们的思想动态还会有不同的……我们是从一个复杂的阶级社会来的。认为只要有一个共产党,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了,这是一个简单化的想法。这样做必然会使我们的耳目闭塞起来……所以,从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只要还有党派的时候,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长期共存,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求大同存小异,这并没有坏处……所以,从种种方面看起来,我们这样的大国,多一点党派去联系各方面的群众,对国家,对人民的事业,有好处。以共产党为核心,为领导,各党派团结合作,有什么不好?”^①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剥削阶级的被消灭,各民主党派的性质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们不再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党派了。周恩来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民主党派都是

^①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48~350页。

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①刘少奇 1956 年在中共“八大”报告中就说过：“中国各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就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由于在这部分劳动者中，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还会拖得很长，各民主党派还需要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继续联系他们，代表他们，并且帮助他们改造。同时，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一道长期存在，在各党派之间也能够起互相监督的作用。”

那么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肩负的任务是什么呢？周恩来提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和改造，是整个国家都在建设和改造的理论。因此周恩来在 1962 年 4 月 18 日所作《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的讲话中指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任务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动员更多的可以动员的因素，参加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同时自觉地进行自我改造。

不幸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统一战线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派合作，从 1957 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犯了“左”倾错误的时候起，遭到了削弱；在极左的“文化大革命”大动乱的 10 年，更遭到了严重破坏。在这期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遭到了严重挫折。

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派合作正在进入一个黄金时期

但值得我们庆幸的是，在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共产党领导下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和多党派合作，不但得到了恢复，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正在进入一个空前光辉灿烂的黄金时期。

邓小平指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①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438 页。